

研究者的足迹与他者影像

——松冈正子《青藏高原东部的羌族与藏族——2008汶川地震前后的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

允晨丛刊 177 / 2022年3月15日 / 《论文篇》及《写真篇》

张 曦

前 言

“羌”字虽然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然而却要到了1920年才有了第一部关于岷江上游羌族社会研究的著作，而且是由英国传教士陶然士 (T. Torrance 1871-1959) 写成的 *The History, Customs and Religion of Chiang*。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1987年有了汶川县档案馆内部印刷的陈慧斯翻译版《青衣羌——羌族的历史、习俗与宗教》。其后才有了留法归来的社会学者胡鉴民 (1896-1966) 的《羌族之信仰与习为》(1941) 以及葛维汉 (D. C. Graham 1884-1961) 的 *The Religion of the Ch'iang* (1946)。值得注意的是陶然士与葛维汉选取了汉语“羌”的发音“Chiang”和“Ch'iang”来指代岷江上游的今天的羌族，而胡鉴民则直接使用了汉字“羌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54年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的最早的羌族调研报告《尔玛情况》避开了“羌族”的汉字表述，选用了南部羌语中羌族的自称“尔玛”。1958年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羌族小组成立，直接以“羌族”为名在茂县、汶川等地展开了更为广泛深入的调查。然而，这一调查成果的正式出版被延至20多年后的1986年。1990年费孝通先生的弟子徐平回到汶川县的羌锋村开始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博士毕业后的1993年出版了《羌村社会》一书，这算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部羌族社会民族志著作。在1995年出版的末成道男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化人类学文献解题》中松冈正子女士基于大量的中外文献的把握实事求是地将羌族研究分为了1920年至1949年、1949年至50年代末、1980年至1995年的三个时期。很好的归纳了国外传教士以及华西学派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的羌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羌族社会文化研究的再出发的三大内容。对于理解羌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依旧是简明有效的。

走廊研究的先行者

松冈正子女士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藏羌彝走廊研究的先行者之一，1988年其尚在四川大学留学时，是受中国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的影响，开始关注岷江上游的羌族社会文化状况。其后在羌族地区展开过诸多深入的、专业的田野调查，完成了诸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2000年松冈女士出版了《中国青藏高原少数民族——羌族与四川藏族》（『中国青藏高原東部の少数民族——チャン族と四川チベット族』ゆまに書房）一书。这不仅仅是海外羌族研究中重要的学术贡献，同时也对中国国内的羌族研究带来了良好的刺激。当时九州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者长谷千代子曾撰写书评，盛赞本书为“坚实的实证研究”（长谷千代子 2001）。笔者却认为在这部著作中松冈教授的学术贡献有三：第一、是中立立场的日语表述“チャン族”的使用，选用汉字读音的片假名化，这与陶然士与葛维汉的“Chiang”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日文是可以直接使用汉字的。而“チャン族”的日语表述既避免了汉字“羌族”中隐隐约约的中心主义，以及其历史性暧昧，也避免了“日麦”、“尔玛”、“Rrmea”（90年代新创羌文）的稍显孤立的略带自民族中心（ethnocentrism）性质的主张的强调。如同中国台湾的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强调出的“五十年前‘羌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条沟中的人”的“尔玛认同”（王明珂 2003）那样，“チャン族”的表述体现出了一种研究者的外部中立性。事实上，羌族作为56个少数民族中一员的正式身份的合理性的确实是60年代获得的。1962年9月13日、9月14日《光明日报》刊载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由李绍明先生执笔的“关于羌族历史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上、下）一文才正式明确了古代羌族与现代羌族的关系，厘清历史与现状的关系，也即是确立了岷江上游现代“羌族”的少数民族身份。第二、松冈女士选用介于南北部羌语方言之间的汶川雁门羌语发音的片假名表述“シピ”（spi 释比）来指代羌族地区的宗教神职人士，不仅仅与汉语表述“端公”做出了区别，还强调出了羌族宗教信仰历史悠长的本土性。第三、由于

古羌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域的历史复杂性，松冈女士并没有将今天的羌族与周边的其他民族集团的人群割裂开来。而是沿着历史关系性的认识方向，展开了“四川藏族”的调查研究。笔者也认为该著作“是一部详细的以理县蒲溪乡蒲溪村实例的羌族民族志。但是松冈正子并没有孤立地描述羌族社会文化现象，而是提供了羌族周边的嘉绒藏族及白马藏族的社会文化作为参照系，并探讨了相互之间的文化关系。”（张曦 2017）。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政府迅速展开了灾害救援以及灾后重建工作。出于对羌族地区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诸问题的担忧，松冈女士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绍明老师紧急编撰了《四川羌族——克服汶川大地震》（『四川のチャン族——汶川大地震をのりこえて [1950-2009]』）一书，在日本学界也得到了好评，被称为是“新颖的民族志”（塚田誠之 2011），当然也成为了羌族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足迹坚实：关于《论文篇》

2017年松冈正子出版了日文版『青藏高原東部のチャン族とチベット族——2008汶川地震後の再建と開発』【論文篇】【写真篇】，由于该著作体量庞大、内容涉及面广，以至于同时出现了两篇书评。其中一篇是河合洋尚撰写，河合氏非常直接地捕捉到了书中“羌族新文化”与包括藏族在内的周边诸民族的“基层文化”的呈现意义（河合洋尚 2019）。另一篇是由塚田誠之先生撰写，其在详细的介绍了本书的内容构成以后，也同样关注到了羌族与其他民族集团的文化“类似性”与“连续性”（塚田誠之 2019）。自然这也是本书的意义重要的体现所在。两者的评论还都强调出了本书在藏羌彝走廊研究及中国西南民族集团研究中的积极意义。2023年将是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的第15个年头，能够在2022年读到青藏高原东部或今天经常称作为藏羌彝走廊地区的资深的研究者松冈正子女士著作的中文版（尽管是繁体字版）译作，一方面可以透过文字、照片看到汶川大地震后羌族地区社会文化的新的变化，同样也能再次唤起对民族走廊研究的关注。

本书依旧是松冈女士一贯性研究范式的延续，即以岷涪江上游的羌族社会文化研究为着力点，再扩展至周边民族集团，并探索两者的相关性。《序章》中首先详尽地介绍了1988年以来至2018年30年间在藏羌彝走廊中的42次的

田野调查，田野地涉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北川羌族自治县，以及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其地理范围相当于是费孝通先生1978年首次提及藏彝走廊时的地理范围，即“西边从甘肃南下至云南西陲的走廊”（费孝通 1988）。所调查的民族集团有羌族、纳西族、普米族以及操不同方言的嘉绒藏族、白马藏族、木雅藏族、尔苏藏族、纳木依藏族、扎巴藏族。较著者自身2000年《中国青藏高原少数民族——羌族与四川藏族》一书的研究视野更加扩大，研究对象甚至扩展至了与古羌系民族存在历史渊源的云南的纳西族及普米族。

架构合理的本书章节

总体而言，全书除去《影像篇》以外，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为羌族，共有六章，分别为第一章“近年的羌族相关研究”、第二章“汶川地震后羌族的贫困与迁居”、第三章“汶川地震后的羌族文化”、第四章“羌年”、第五章“羌族的‘家庭’——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大瓜子寨为例”、第六章“黑水藏族”。前五章涉及到了汶川地震后人口移动、文化变迁、社会最小单位——家庭的全方面的调查研究，大量详实的调查数据以及深入的分析清楚地呈现出了岷涪江上游羌族地区灾后重建后的状况。对于文化变迁的分析则落脚于“禹羌文化”、“观光资源化”、“母语丧失”、“羌年（日美吉）”上，从中可以看到因灾后重建时国家、政府的强有力的介入、而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再整合及整合过程，如羌历年、转山会的变化。而“黑水藏族”是因为其语言与生活习惯与羌族无二，而被列入了最后一章，但几乎都是以先行文献资料建构而出。书中松冈女士自谦道“收集到的关于黑水的资料并不多”（松冈2022），但对于民国时期于式玉、蒋旨昂的调研，再到黎光明、王元辉的报告都有涉及，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尚有东亚同文书院第27期“巴蜀岷涪经济调查班”1930年的报告材料，更加充实了黑水藏族研究的内含。松冈女士未能涉足黑水进行田野，大概是因为直到2004年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只有黑水县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

第二部为四川藏族，共有七章即：第七章“关于四川藏族各支系的先行研究”、第八章“嘉绒藏族：古碉记忆与资源化——以四川丹巴县的‘碉’为案例”、第九章“纳木依藏族”、第十章“尔苏藏族”、第十一章“史兴（虚米）”

藏族与‘西番’”、第十二章“四川与云南的普米族集团”、第十三章“四川的纳西语集团”。先行研究由“藏彝走廊研究”与“川西南‘西番’”构成也是顺理成章之举，羌族研究离不开今天藏羌彝走廊的其他民族集团的研究，而西番研究就是松冈女士羌族研究中最早的外部延伸。第八章将嘉绒藏族的建筑作为研究突破口，讨论了建筑的文化遗产与个人记忆，并有机地联系到国家、地域的如“藏家乐”等传统文化的观光资源化。第九章则是将纳木依的搬迁及搬迁后的文化变迁如祭山会的停办、汉族春节文化的移入作为主要讨论议题，顺带讨论了“西番”问题。第十章以尔苏的神石“Jo”的信仰联系至迁徙记忆，再次证实了藏羌彝走廊地区羌族与藏族、纳西族等民族集团有着共通的基层文化。第十一章以中国最大的自治县——四川凉山州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水洛乡为例讨论“西番”民族集团，明确地指出了尽管受到汉族文化、藏族文化的影响“西番”依旧维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第十二章及第十三章是松冈女士自身研究的延长。对于普米语集团以及纳西语集团的讨论，不仅深化了岷涪江上游的羌族研究，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民族走廊整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藏羌彝走廊中各民族集团祭山仪式的深入剖析，再度体现出了走廊中各民族集团的文化关联性。

灾后重建与人口移动

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在灾后重建中最显著的就是人口的空间移动，是高半山羌族向县城（茂县）以及更远的成都平原（都江堰、邛崃市、崇州）的人口流出。这也是本书第二章关注的重要内容。松冈女士捕捉到了灾后羌族迁居中实际上存在的“政府主导的整村搬迁”与“自发性迁居”两种类型。并且找出了“政府主导搬迁”的潜在要素，即地震发生以前已经存在的并已实施的高半山地区的贫困解消策略。作者以“空间社群”来看待移居后新的共同体的生存样态，这也是一个有益的分析工具，为了使这个工具更为有效，随后又引入了习惯法的分析框架，新的乡规民约的再建构赋予地域共同体成员新的行为准则，也使得新的地域共同体获得了发展的基础。

其实在新中国以前，岷江上游的羌族就形成了季节性移动的生计方式，其原因第一不外乎岷江、涪江上游就是藏羌彝走廊的北部开口处，因其地理空间特征，沿着河谷上下走向自然而然形成了东南—西北向的人员移动的通

道。西北可达甘肃、青海，东南则直接进入了成都平原。第二，岷江、涪江上游的高海拔，气温偏低，带来了漫长的冬季农闲时期。作为生计方式的补充，至少在明代羌族就已经形成了季节性移动的习惯，如冬季南下至都江堰、绵阳及成都平原务工，或充任职业、半职业的物品（茶叶、米、盐、百货等）搬运的背夫，这种生活样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因城乡二元户口制度而被迫停止了移动。释比唱经中有区别与羌族文化地区的“yedzuo（汉区）”和区别于岷江上游山区的“padzuo（坝区）”的特殊表述。而“汉区”、“坝区”在狭义上都指的是灌县（duoke 今都江堰市）。然而广义上的“padzuo（坝区）”还是一个更为宽泛的地理概念，甚至可以扩展至今彭州市、今成都市高新区（原郫县）、崇州市、温江等地。这种表述就是羌族人移动的历史性经验结果。

在理解走廊民族集团的基层文化时，本书第八章嘉绒藏族碉楼为例，第十章以尔苏藏族的神石（Jo）为例，结语 II 则选择了各民族集团的祭山为例，展开了走廊中基层文化的论述。的确白石崇拜是走廊中的文化底色，同时又与建筑密切相关，嘉绒地区的碉楼因乾隆时期的两次金川之役而名声鹊起，上个世纪随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的旅游发展政策而被资源化。尽管有关碉楼的争论颇多，但对碉楼的宗教意义都是肯定的，尽管在旅游发展中刻意地避开了宗教因素。碉楼从现代羌语“俄鲁”（[ɿlu]）木雅语中“邛笼”（[gə³³lu³³dzu³³]）、纳西东巴文字“𑄎”（[uə³³]），以及嘉绒语的“卡鲁”“mkhar”都能看到共同的语言要素。神石“Jo”及白石更是走廊中普遍性的文化存在。祭山会同样是走廊诸民族集团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的清晰呈现，一方面可以看到基层文化在适应不同地域环境样态与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地域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文化资源所在。尽管祭山被放置在最后的结语 II 中，但是也起到了总结性作用。

影像文本与乡愁——《影像篇》

众所周知，人类学民族志中影像的运用可以追溯到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 Malinowski 1884–1942）。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2）中曾提出了田野调查（field work）中应该采用多样性手段收集材料。其中就包括能够捕捉诸多社会生活细节、空间、物质材料的摄影手段的使用。文字文本与摄影文本相互补充的形式，也

形成了后来学者们所称的超文本（hypertext）的民族志形式。马林诺夫斯基自身所拍摄照片不仅是重要的影像资料，也成为了后期研究、分析的影像文本。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学院（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ustralia）的杨格（Michael W. Young）就称马林诺夫斯基尤其擅长远景摄影（longshot），由此可以更多地包含调查地的人物、事物等内容（Michael W. Young 1998）。

塚田诚之先生在评述篇幅长、还包括大量照片的『四川のチャン族——汶川大地震をのりこえて [1950-2009]』一书时直接以“照片映射出了时代”（「写真は時代を映し出した」）作为了题目。毫无疑问，这些照片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长度，涵盖了上世纪80年代及21世纪初期，尤其是聚焦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前后，内容涉及到日常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自然是民族走廊社会变迁历史的最好写照。书中云南摩梭人、云南纳西人的影像记录，不仅仅是地理范围的扩大，而且是增加了走廊民族集团社会文化事象的深厚感。也即是影像文本涵盖了时空两个维度，最大限度地呈现出了藏羌彝走廊的历史与现状。如果套用法国影像人类学家让·鲁什（Jaen Rouch 1917-2004）的话来说，松冈女士的照相机也已经成为了“参与照相机”，同时相信这本影像集也会像让·鲁什主张的“共有人类学”（anthropologie partagee, shared anthropology）一样，在被调查研究的对象的身上形成“共有”（shared），现在看来至少会在走廊研究者中形成“共有”。

笔者出生于理县，自身的田野调查地与松冈女士的田野调查地有许多重合之处，因此诸多影像首先唤起的是笔者的乡愁。现代性与发展的确改变了我们个人最为熟知、最带有个人色彩的领域。英国社会学学者罗伯特逊（Roland Robertson）在上世纪末就认为因为要理解先于现代化的全球化现象，需要首先理解乡愁，因为由全球化引发的对抗性反动包括近代的民族运动、土著文化运动都是与乡愁相关联的。因此，影像文本就是诱发乡愁的最直观的因素，同时也是形成“文化意识化”重要部分。正是因为“文化意识化”，才会形成新的“文化自觉”，才能利于走廊中传统文化的新的的发展。

结束语

自“藏彝走廊”概念提出至今已有40年以上的历史，5.12汶川大地震以后，羌族地区也成了研究热点地区，也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成果。然而基于踏

实田野调研的民族志性质的研究依然为数不多。2003年11月费孝通在给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中国西南民族学会联合举办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写道：“藏彝走廊”的研究应该“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石硕 2005），松冈女士的著作一方面有着详实的田野材料，一方面扎根于藏彝走廊这一“特定地区内部”，由羌族与其他民族集团的田野材料与深入分析的确在相当的程度上认识到了“文化接触的历史与现状”。不仅丰富了、深化了“藏彝走廊”的研究，也为今后的民族走廊研究进一步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与现在中国的“藏彝走廊”或者“藏羌彝走廊”研究一样，松冈女士关注到了羌族地区，并向西南延伸至傈僳族与纳西族。首先，这也提醒我们今后的研究应该延伸至西北方向与羌族地区、藏族集团地区存在着地理性、文化性关联的北部地区、如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延伸，促进走廊研究的丰富。尽管这一地区有不少研究，但都未能整合进民族走廊研究中来。

再者，今后需要着力于走廊中回族及相关民族集团的研究。其实早在1910年，英国新教传教士布鲁姆霍尔（Marshall Broomhall 1866-1937）就在著书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 中提到中国的历史社会研究中，长期忽视了穆斯林群体的研究。至少在元代时，沿着走廊通道，就有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在人口相对密集的集镇村落定居建立清真寺，并以寺为中心形成聚居形态，以其生计在想当程度上带动了走廊中资本与物的移动，同时还逐步形成了“藏回”、“白回”等特殊的民族集团。然而现在的走廊研究中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尚有不足。

在研究手法上，除过传统的研究手法，可以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剔除权力的非对称关系后，借鉴文化接触地带（contact zone）中的复数的民族主体的主体能动性这样的研究模式来探讨走廊中基层文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机制。尽管接触地带概念的提出者帕拉特（M. L. Pratt）的概念定义为：“殖民地主义、奴隶制支配的社会空间”（M. L. Pratt 1992），但这个社会空间中的确存在着不同主体的文化的相互作用。总而言之，松冈女士在本书不仅贡献出了坚实的研究，同时透过这些研究还能使我们看到今后的更广、更深厚民族走廊社会文化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费孝通 1988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Mary Louise Pratt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s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末成道男 編 1995 『中国文化人類学文献解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第
39-41頁。
- Michael W. Young 1998 *Malinowski's Kiriwina: Fieldwork Photography 1915-191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塚田誠之 2011 「写真が時代を映し出した—李・松岡『四川のチャン族—汶川
大地震をのりこえて [1950-2009]』」『中国21』Vol. 34. 第323-330頁。
- 2019 「藏彝走廊の少数民族、その生活と変貌及び基層文化—松岡正
子『青藏高原東部のチャン族とチベット族——2008汶川地震後の再建と開
発』」『中国21』Vol. 49. 第218-225頁。
- 河合洋尚 2019 「松岡正子著 青藏高原東部のチャン族とチベット族——2008
年汶川地震後の再建と開発【論文篇】」『中国21』Vol. 49. 第226-231頁。
- 長谷千代子 2001 『民族学研究』65巻、第4号。第408-409頁。
- 王明珂 2003 《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
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石硕 主编 2005 《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李紹明 松岡正子 編 2010 『四川のチャン族——汶川大地震をのりこえて
(1950-2009)』東京：風響社。
- 张曦 2017 《民族走廊与地域社会：羌族社会·文化的人类学思考》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